

习近平新时代大国外交思想研究

# 中美竞争背景下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黄乐平

**内容提要：**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应加强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扩大伙伴关系网络。近年来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关系突飞猛进，中拉命运共同体已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然而，当前中拉关系的本质仍是理性主义主导的复合相互依存关系，双方仍处于利益驱动的洛克文化中，合作的绝对收益带来的共赢并不能掩盖相对收益分配不平衡造成的冲突。此外，美国历来视拉美为其“后院”，对中国在拉美的一举一动十分敏感。中拉关系要克服其内在矛盾和外在不利条件，实现提质升级，就要超越纯粹理性主义的功利关系，由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跨越。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无政府文化是国家造就的，是行为体互动和社会建构的结果。中国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必须积极作为，利用国际机制与拉美国家开展更广泛、更深层次的互动，在现有共识基础上形成更多共有观念和群体认同，通过全球治理合作、产能合作和人文交流，互塑和建构新的集体身份和集体利益，构建真正共赢的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中美竞争 中拉命运共同体 复合相互依存 建构主义 康德文化

**作者简介：**黄乐平，经济学博士，深圳大学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D822.3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2) 04-0077-20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当前中美竞争加剧成为大变局中最令世人瞩目之焦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美相对实力的变化，美国开始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压制中国，进而通过贸易战、科技战、印太战略主动挑起中美竞争。拜登政府上台后更是利用涉港、涉疆、涉台等问题拉拢其盟友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频频发难，在台海、南海制造军事威胁。这些都使得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经济和安全环境不断恶化。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国一方面要针锋相对，另一方面要保持战略定力、与美国斗而不破，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团结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更广泛的国际支持，从而在中美竞争这场持久战中赢得主动。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下简称“拉美”）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历来是中国外交和对外合作的重要对象，是中国外交取得重要发展的标志，也是中国对外开放多元化的重要支点。21世纪以来中拉经贸关系飞速发展，全方位合作方兴未艾，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拉美领导人会晤中正式提出要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然而，美国历来视拉美为自己的“后院”，对域外势力进入拉美始终心存戒备，近20年来不断加强的中拉战略合作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作对其安全的威胁。在当前中美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门罗主义”再次抬头，“中国威胁美国后院论”再次甚嚣尘上。相对于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合作，中拉合作和命运共同体构建面临来自美国更直接的挑战和干扰。

本文试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视角探讨两个层面的问题：从理论层面看，当前中拉关系的实质是什么？未来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和内涵应是什么？该共同体如何为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从中拉关系实践的层面看，中拉合作如何克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实现稳步健康发展？以及如何夯实现有合作基础、阔步迈向新的阶段？

## 一 现有研究述评

国内外与本文主题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中拉关系和中拉命运共同体研究。关于中拉关系的发展阶段、战略定位和意义，国内有研究指出中拉关系已超越既往的“自然生长”方式，进入以双方主动构建为主要特点的新发展阶段；在战略定位上中国将拉美从对外关系格局里相对边缘的选项转化为显性“增量”，而拉美则将中国作为其

发展战略中重要的外部合作选项之一，某些国家甚至将中国视为平衡西半球地缘政治格局和抵御北方大国霸权的重要砝码。<sup>①</sup> 关于合作战略和路径，有研究认为中拉合作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这个重要抓手，在“五通”领域中寻求共赢，促进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sup>②</sup> 中拉应借助“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实现发展战略对接，使拉美成为中国发展的有力支撑。<sup>③</sup> 拉美学者也在探索未来中拉合作的路径。有研究指出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和能源合作的基础上，中拉应在环保、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开创新的合作领域。<sup>④</sup> 然而有些拉美和欧美学者仍对中拉关系的本质存疑，认为中拉贸易互补貌似“完美婚姻”，但实质上依然是旧有的“中心—外围”关系，不利于拉美产业升级。<sup>⑤</sup> 而对未来中拉经贸合作的专门研究恰好有助于释疑。国内有研究指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将为中拉经贸合作提供商品机遇和资本机遇，而“一带一路”倡议将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拉美对能源、道路、通信、互联网等软硬件投资和工业经济升级的需求。<sup>⑥</sup> “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拉美参与全球价值链和攀升产业价值链，有利于解决其产业结构失衡、基础设施落后、区域一体化发展不足、营商环境不完善、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sup>⑦</sup> 然而有拉美学者对中国对拉投资领域和对象集中的问题表示担忧，同时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减速和大宗商品价格走低，中国企业会在海外市场寻求新的投资领域，如服务业。<sup>⑧</sup>

其次是中美拉三边关系研究。21世纪初，针对“中国加速进入美国‘后院’会损害美国利益、削弱其在美洲的影响力”的论调，有国内研究指出中

① 张凡：《中拉关系及中国对拉战略研究的一种进路：进展与问题》，载《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1期，第26-27页。

② 江时学：《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拉美命运共同体探究》，载《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7期，第70页。

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课题组：《“一带一路”视角下提升中拉合作的战略思考》，载《拉丁美洲研究》，2018年第3期，第1页。

④ Cepal, *Explorando Nuevos Espacios de Cooperación entr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y China*, Santiago de Chile: Cepal, 2018, pp. 3-6.

⑤ Ralf J. Leiteritz,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A Marriage Made in Heaven?”, in *Colombia Internacional*, Vol. 75, No. 1, 2012, pp. 49-81; R. Jenkins, “Latin America and China – A New Dependency?”, i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3, No. 7, 2012, pp. 1337-1358.

⑥ 岳云霞：《中拉经贸合作：改革开放的动能、影响与导向》，载《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18年第6期，第29页。

⑦ 张勇、史沛然：《“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拉经贸合作机遇：全球价值链视角》，载《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2期，第35页。

⑧ Miguel Pérez Ludeña, *Chinese Investments in Latin America: Opportunities for Growth and Diversification*, Santiago de Chile: Cepal, 2017, p. 5.

拉关系秉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且中拉关系历史短、起点低、基础薄弱，同时美国对拉美的影响力无可匹敌，而大多数拉美国家出于自身安全与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也将发展并巩固与美国的关系置于其对外战略的首位，因此中国无意也不可能威胁美国“后院”。<sup>①</sup>有美国学者也认为，中拉不太可能建立同盟来限制美国对拉美的影响，但美国应该警醒，重视与拉美的关系。<sup>②</sup>然而十余年后，美中两国在拉美地区存量与增量的优势差异矛盾、美拉之间“门罗主义”思维与拉美联合自强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使中美拉三角关系的动态格局呈现愈加复杂的变化趋势。<sup>③</sup>对此，美国学界“鹰派”认为中国正在拉美“破坏性崛起”，因支持左派“民粹主义”政权和扶植“代理人”而逆转了拉美民主化进程，是美国主导的西半球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sup>④</sup>但也有拉美和美国学者认为中拉关系的重点仍是经贸领域，中国并未在拉美寻求与美国霸权对抗，“新两极格局”和西半球“新冷战”的提法并不准确。然而，中拉关系升温的间接后果是拉美对美国逐渐疏离，美国对拉美的影响力逐渐减弱。随着中美关系不断紧张，拉美可能成为两国新的“竞技场”。<sup>⑤</sup>

综上，现有文献广泛研究了中拉经贸合作的路径、“一带一路”对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中拉关系的发展阶段和战略定位，同时研究了中美拉三边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美国学界和政界对中拉关系的定性和反应以及中国应采取的应对策略，然而此类研究仍然存在可进一步探讨和突破的空间，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现有文献学理性研究较少。如何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和把握中美拉三边关系的实质和未来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及构建路径，中拉如何超越纯粹理性主义的功利关系、在观念和文化上建立紧密的精神纽带和伙伴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其二，现有文献对新形势的关注较少。在当前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全球产业链遭受破坏并有待重构、中美

① 吴洪英：《“拉美成为中国后院论”辨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3期，第36-42页。

② R. Roett and G. Paz, *China's Expansion into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mplications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p. 239-259.

③ 周志伟：《如何看待中美拉三角关系中的两组结构性矛盾》，载《当代世界》，2018年第4期，第31-34页。

④ E. Ellis, *China on the Ground in Latin America: Challenges for the Chinese and Impacts on the Reg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 8.

⑤ Detlef Nolte, "The Dragon in the Backyard: US Visions of China's Relations toward Latin America", in *Pap. Polít.*, Vol. 18, No. 2, 2013, pp. 587-598; José León-Manríquez and Luis F. Alvarez, "Mao's Steps in Monroe's Backyard: Towards a United States-China Hegemonic Struggle in Latin America?", in *Revista Brasileira de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No. 57 (special edition), 2014, pp. 9-27.

竞争全面升级、美国有可能通过产业链区域化和5G建设等问题逼迫拉美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新形势下，中拉关系如何克服美国的干扰，在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的指引下，利用好“一带一路”这个重要抓手，加强中拉在产能等领域的合作，值得我们研究。

## 二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流理论梳理

作为国际关系学一个学科分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滥觞于20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论战。在二战和冷战前半期，强调权力和冲突的古典现实主义主导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其代表人物摩根索在1948年总结出现实主义的3个核心观点：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国际政治的实质是权力政治；安全是世界政治的首要问题，军事是权力政治的核心。<sup>①</sup>20世纪70年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及越战结束，西方国家陷入滞涨。与此同时，欧洲一体化的推进使国际经济上升为“高层次政治”，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的趋势引发关注。在这一背景下，自由主义理论复兴，国际政治经济学兴起。自由主义学者基欧汉和奈提出“复合相互依存”理论，对现实主义上述3个观点提出质疑，认为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亦可直接参与国际政治，各问题间无明确的等级区分，军事力量不是主要的政策工具。<sup>②</sup>但其同时指出，相互依存并不意味着互利，而是包含代价（依存限制自主权）、伴随冲突（依存各方存在相对受益和相对受损）的；相互依存也包含竞争，并不必然“非零和”；不对称性是相互依存政治的核心，依赖性小可以是一种权力资源。<sup>③</sup>那么，维持和管理这样一个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需要什么条件和前提？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的兴衰和国际政治关系在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中有重要意义，国际机制只不过是霸权国为维持国际体系稳定而提供的公共产品。如果霸权国承担的义务和成本超过其收益，就会走向衰落，并有可能与新兴国家爆发霸权战争，

<sup>①</sup> [美] 汉斯·J. 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9-343页。

<sup>②</sup> [美]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33页。

<sup>③</sup> [美]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15页；[美] 小约瑟夫·奈、[加拿大] 戴维·韦尔奇著，张小明译：《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37页。

从而带来国际体系变革、新的霸权冲突和霸权更替。<sup>①</sup> 而自由主义学者则认为国际机制是因国家间为降低交易成本、摆脱“囚徒困境”的需求而产生的，霸权国的衰落并不必然带来不稳定和冲突，因为各国有共同的利益，会通过维持现有国际机制和创造新的合作机制来实现合作。<sup>②</sup>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虽然相互争论，但基本都属于理性主义的范畴，因为它们或重视物质性因素对行为体的直接影响，或强调行为体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理性选择。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形成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则强调物质因素的社会化和观念化，既坚持科学实在论的认识论，又坚持理念重于物质、观念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的本体论，希望在理性主义和各种反思主义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并通过在20世纪90年代与自由主义的论战使国际政治研究由理性主义转向建构主义。<sup>③</sup> 此次论战围绕国际制度为何能促成合作这一论题展开。自由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偏好都是先验的，面对国际制度，行为体会利用规则来进行理性选择，在合作中实现利益最大化。而建构主义则首先认为无政府状态不是先验的客观事实，而是国家造就的，是行为体互动和社会建构的结果，既可以形成霍布斯文化（每个人反对每个人），也可以形成洛克文化（承认相互生存权并竞争）和康德文化（构筑友善共同体）。<sup>④</sup> 此外，身份和利益也是后验、互动的结果<sup>⑤</sup>，其基本逻辑为：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或相互学习）形成一定的文化及国际规范和观念，进而在现有或首创的制度中得到认同（形成共有知识和文化）并取得合法性，得到各成员认可，然后通过制度来建构行为体身份和利益，并最终决定其行为。<sup>⑥</sup> 建构主义代表人物温特认为，虽然各国在无政府状态下存在实力差异和竞争，但各国也追求平等，需要被承认；身份高度认同后会出现世界国家，到那时真正的世界治理才会实现。可见，建构主义是一种乐观的进化理论，它认为

① [美] 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85-207页。

②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65-109.

③④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译者前言VI-XXVII，第244-296页。

⑤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s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35.

⑥ Friedrich V. Kratochwil, *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 O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56-88.

国际社会将朝着康德文化的方向发展，朝着世界政府和世界大同的方向发展。<sup>①</sup>

然而，正是由于霍布斯结构、洛克结构和康德结构这三种政治文化都是由行为体互动建构的，因此在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中受规范内化等级不同的影响会形成不同的共有观念和政治文化。温特认为，行为体在遵循上述三种文化规范时的三种理由或曰规范得以内化的三种等级，分别是被迫遵守（武力）、利益驱使（代价）和承认规范的合法性，这三种理由基本上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念主义）关于规范在国际生活中的作用的理论相对应。只有在第三种内化等级即合法性上，行为体才真正被文化所“建构”。<sup>②</sup> 同样的国家（行为体）之间因不同的互动和社会建构方式，会建构不同的观念、身份和利益，从而造就不同的无政府文化。例如，欧洲国家之间历史上曾处于霍布斯文化和洛克文化中，而二战后在北大西洋国家之间以及在欧盟国家之间，其行为体的互动和共有观念、身份和利益的建构处于规范内化的第三等级，因此超越洛克文化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康德文化结构。与其形成对照的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美国及西方国家之间的互动及共有观念、身份和利益的建构过程，受到大国竞争博弈、缺乏政治与安全互信等现实主义及文化因素影响而并未发展为规范内化的第三等级，因此未形成康德文化，仍处在介于霍布斯文化和洛克文化之间的结构中。

### 三 中美拉三边关系的现状和挑战：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上文梳理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主流理论尤其是建构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并总结了建构主义提出的国际体系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的特点。下面将从这一理论视角分析中美拉三边关系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 （一）中美拉三边关系的现状

当前中拉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美拉关系仍处于洛克文化中。洛克文化的特点是国家间的主要关系不是安全冲突而是经济相互依存和理性主义的竞争，但相互依存具有不对称性和对彼此不同程度的依赖性，以及存在因相对收益不均而产生的冲突。首先看中拉经贸关系。21世纪以来中拉经济相互依存度

<sup>①</sup> Alexander Wendt, "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i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9, No. 4, 2003, pp. 491-542.

<sup>②</sup>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47页。

不断加强。2020年中拉货物贸易总额为2002年数额的18倍，达到3201.2亿美元，占当年中国与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6.9%；2020年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净额为166.6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世界直接投资净额的10.8%，是对非洲投资的3.9倍、对美国投资的2.8倍。<sup>①</sup>2018年1月，中国正式邀请拉美国家自愿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截至2022年3月，已有21个拉美国家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共建协议。中拉经贸关系飞速发展得益于21世纪头十年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世界经济处于繁荣周期以及中美关系相对稳定。再来看中美经贸关系。中美自1979年建交以来，走过40多年的曲折发展过程，美国始终希望“非自由”的中国向“自由”的美国靠拢，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sup>②</sup>，因此将中国视为“有缺点的合作伙伴”。2020年中美货物贸易总额为5869.8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净额为60.2亿美元，实际利用美国直接投资23亿美元。<sup>③</sup>最后看美拉经贸关系。美国始终是拉美国家最重要的经贸伙伴。2021年美拉货物贸易总额为9640.3亿美元，是中拉货物贸易额的3倍（见图1）；2019年美国对拉美直接投资存量为9310.2亿美元，近年来有被中国赶超的趋势（见图2）。<sup>④</sup>从对拉投资类型看，美国无论在跨国并购还是在新开工项目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但2020年在跨国并购方面被中国、西班牙等国超越（见图3、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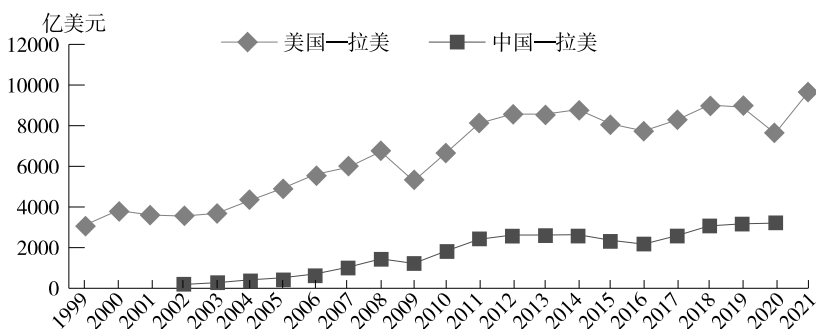


图1 美拉和中拉货物贸易额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https://www.bea.gov>）和中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数据绘制。

① 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22-05-20]

② N. De Graaff and B. Van Apeldoorn, “US - China Relations and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Contending Elites, Colliding Vision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No. 1, 2018, pp. 113 - 131.

③ 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22-05-20]

④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对拉投资主要为金融投资。例如，2020年中国对拉直接投资存量6298.1亿美元中有97%位于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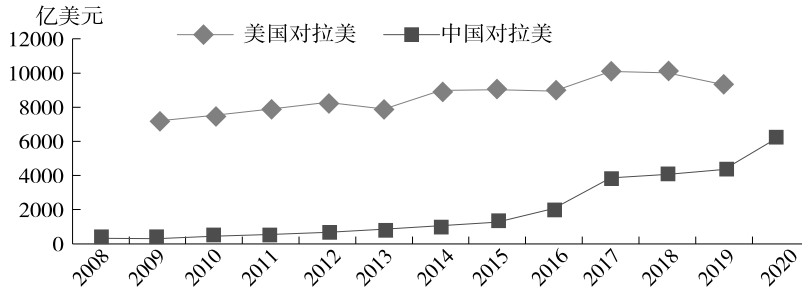


图2 美国对拉美地区和中国对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https://www.bea.gov>) 和中国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 数据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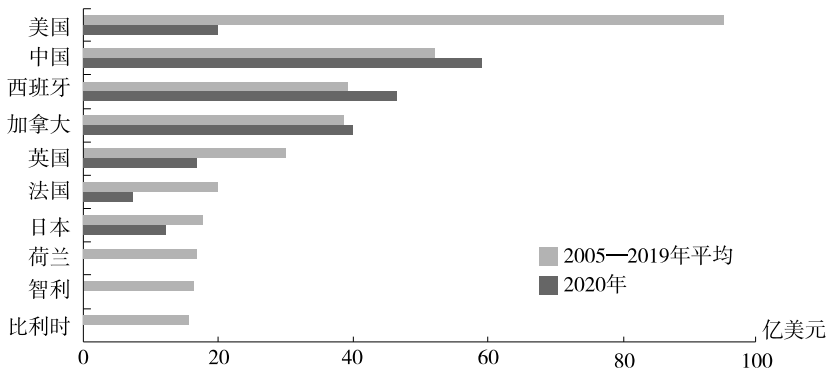


图3 世界部分国家在拉美的跨国并购投资

资料来源：Cepal, *La Inversión Extranjera Directa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Naciones Unidas, Santiago, 2021, p. 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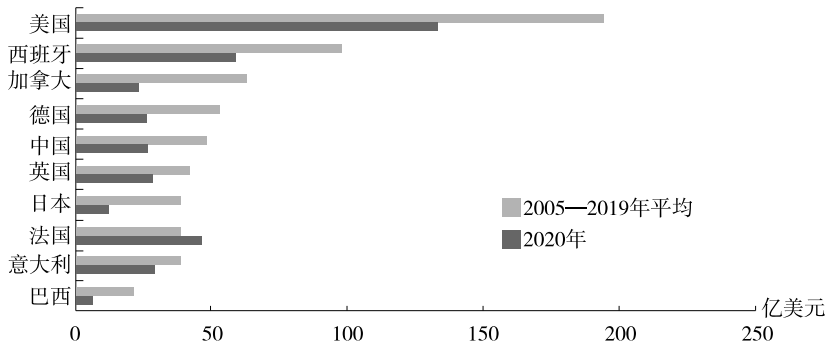


图4 世界部分国家在拉美的新开工项目投资

资料来源：Cepal, *La Inversión Extranjera Directa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Naciones Unidas, Santiago, 2021, p. 111.

自由主义学者米尔纳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4个要素阐述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的特征：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成为世界政治的重要行为体，经济力量等因素成为除军事力量之外新的世界政治权力，相互依存成为国际体系的定义特征，世界政治中的合作是可能的。<sup>①</sup> 美中两国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依存，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合作是自建交40年来中美关系的基本共识。而中拉、美拉在经济合作共赢的目标驱动下，相互依存程度也不断加强。按照建构主义学者温特的观点，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其实大部分处于所谓的洛克文化之中，即国家间为竞争关系，相互承认生存和自由权利，尽量避免战争并将其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对合作产生的绝对收益更加看重。各国相互承认主权，其实就是共享一种制度，共有一个期望，共同维护一套国际法。所以说，国际法并不仅是一种物质力量，更是一种共有观念，其内涵是相互尊重和承认。相对于被强迫，当前中美拉各方形成洛克文化更多的是出于理性主义的利己动机，也就是说遵守共同的规范和制度符合其自身利益。<sup>②</sup>

## （二）中美拉三边关系面临的挑战

中拉关系经过反应式、顺势而为的自发发展和自主发展两个阶段，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进入区域性、整体性、全面性合作新阶段，在利益需求驱动的基础上，双方合作更注重顶层设计、政策沟通、建立对话和合作机制，以及人文交流。<sup>③</sup> 然而恰恰是发展到这一阶段，中拉关系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开始逐渐显现出来，在很多领域进入“瓶颈”期，主要问题在于贸易结构不平衡导致拉美国家对中拉关系产生疑虑。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CEPAL）统计，2013年拉美对华出口中73%为初级产品，仅6%为制造产品，而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中这两个数字分别为41%和42%，同时中国对拉美出口中91%为制造产品。对此，有评论认为中拉贸易结构简言之就是制成品交换原材料。<sup>④</sup> 2017年拉美对中国贸易赤字达670亿美元。另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统计，1995—2013年期间，中国对南美洲国家的贸易互补性指数

<sup>①</sup> Helen V. Milner and Andrew Moravcsik (eds.), *Power, Interdependence, and Nonstate Actors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5-21.

<sup>②</sup>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72-281页。

<sup>③</sup> 吴白乙主编：《面向新时代的中拉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5页。

<sup>④</sup>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著：《第一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与中国探索经贸和投资合作空间论坛》，智利圣地亚哥：联合国出版，2015年，第23页。

平均为 0.449，而南美洲国家对中国的该指数平均为 0.291，即中国的出口商品可满足南美洲国家 44.9% 的市场需求，而南美洲国家的出口商品只能满足中国 29.1% 的市场需求。<sup>①</sup> 这说明拉美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远高于中国对拉美的贸易依存度。这样的贸易结构和国际收支虽然是由中拉双方的比较优势和市场行为导致的自然结果，但似乎与拉美结构主义和依附论所描绘的“中心—外围”结构以及贸易比价恶化现象一致，因此容易引起一些拉美国家的不满，认为这样的贸易结构不仅不利于其债务的减少，更重要的是对拉美国家的制造业形成了强烈冲击，导致其经济脆弱性增加，患“荷兰病”的风险加剧，不利于其产业结构升级和扭转“去工业化”“大宗商品化”的趋势。<sup>②</sup> 因此，有些人将中国在拉美的经济存在称为“新殖民主义”。另外，墨西哥等制造业相对发达的拉美国家时常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诉讼，贸易争端频发，并在美国等第三方市场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正如上文中复合相互依存理论所指出的，相互依存并不必然“非零和”，也包含竞争并伴随着冲突。虽然合作为各方带来绝对收益，创造双赢，但相对收益分配不平衡会造成一定的政治冲突。<sup>③</sup>

中拉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但这种相互依存是不对称的，在这一关系中，中国的依赖性低，脆弱性也较低，因此改变该相互依存体系结构（逃离体系或改变游戏规则）和政策调整的相对成本较低；但是中国的敏感性并不低，因为来自拉美的初级产品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有很重要的意义，中国很重视同拉美的经贸合作。而拉美在中拉相互依存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都较高。拉美历史上长期存在对欧美“中心国家”的经济依附。目前很多拉美国家虽然继续实行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但仍然希望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工业化程度实现现代化和民族振兴，因此对中拉贸易对其经济结构的正负面效应及从中获得的相对收益非常敏感。中国是很多拉美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化甚至通过中拉贸易影响到拉美国家的经济走势，因此在中拉相互依存关系中，拉美的依赖性和脆弱性较高。可见，当前中拉关系仍处于理性主义的、利益驱动的、因相对收益不平衡会造成冲

<sup>①</sup> G. D. Silva, M. F. M. Gomes y E. C. Teixeira, “Efecto Derrame del Crecimiento de China en América del Sur: Un Análisis Basado en el Comercio Internacional”, en *Revista de la CEPAL*, No. 126, 2018, pp. 57–58.

<sup>②</sup> J. D. Lima y A. Pellandra, “La Irrupción de China y su Impacto sobre la Estructura Productiva y Comercial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en *Serie Comercio Internacional*, Santiago: Cepal, Naciones Unidas, 2017, p. 7.

<sup>③</sup> [美] 小约瑟夫·奈、[加拿大] 戴维·韦尔奇著，张小明译：《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333–337 页。

突的复合相互依存阶段。虽然拉美因其高度敏感性往往成为冲突的发起方，但中拉双方都有跨越当前阶段、迈向更高层次合作阶段的愿望和动力。

影响中拉合作的两个重要外部变量——中美关系和美拉关系虽基本保持相互依存的基调，但近年来出现诸多不确定性，在地缘政治上为中拉合作带来挑战。首先，当前中美关系有从复合相互依存滑向现实主义的风险。霸权稳定论者认为霸权国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之间存在一种“霸权困境”：霸权周期前期，霸权国更多追求绝对收益，愿意维持一个导致与竞争者差距缩短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霸权周期后期，霸权国更多看重相对收益，更倾向于实行重商主义政策，而这最终会导致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衰退甚至崩溃。<sup>①</sup> 在中国崛起和美国霸权衰落的背景下，美国开始注重中美战略地位的相对变化及其相对收益的变化，不惜背弃其维护多年的自由贸易原则而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贸易战和科技战，甚至不惜发出新冷战威胁，以压制中国发展。另外，霸权稳定论者认为霸权更替将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美国学者奈虽然认为只要不发生战略误判，中美之间的战争并不必然发生<sup>②</sup>，但随后又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担心中国在崛起的同时不能提供足够的全球性公共产品，进而引发全球治理体系崩溃。<sup>③</sup> 其次，美国对拉美政策的霸权主义意图逐渐回归。为扭转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因反恐战争和“重返亚太”而与拉美关系相对疏远的趋势，以便重新控制拉美，阻止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乘虚而入”，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调整对拉政策，具体为：以价值观为标准拉拢拉美右翼，打击左翼，遏制反美联盟，以解构其地区内部凝聚力和团结，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通过重新主导美洲国家组织等机构来弱化拉美国家自己主导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和影响力；重新强调门罗主义的价值，通过宣扬“中国威胁论”、推出与“一带一路”倡议针锋相对的对拉投融资法案和“美洲增长”倡议、打击中拉整体合作最主要的平台——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以达到阻挠中拉合作、排挤中国的目的。<sup>④</sup>拜登

<sup>①</sup> Arthur A. Stein, “The Hegemony’s Dilemma: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8, No. 2, 1984, pp. 355–386.

<sup>②</sup> Joseph S. Nye, Jr., “The Challenge of China”, in Stephen Van Evera (ed.), *How to Make America Safe: New Policies for 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2006, pp. 73–78.

<sup>③</sup> 杨增崇、杜成敏：《“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实质评析》，载《思想教育研究》，2018年第7期，第75页。

<sup>④</sup> 严瑾：《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拉美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载《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2期，第22–39页。

政府上台后虽一改特朗普政府的对拉强硬姿态，但通过“扶右打左”控制拉美的总方针不变。2021年，拜登政府推出“重建更好世界”计划（B3W）并将委内瑞拉等左翼政府执政的拉美国家排除在外，试图进一步巩固美国在拉美的主导地位。

综上，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当前中拉之间的主要关系是相互依存和理性主义的竞争，其相互依存具有不对称性和对彼此不同程度的依赖性，存在因相对收益不均而产生的冲突。因此，中拉关系仍处于洛克文化中，现阶段该文化实现的主要路径和规范内化的方式依然是利己，相互依存的主要驱动力依然是利益。影响中拉合作的两个重要外部变量——中美关系、美拉关系也处于相互依存的洛克文化中，而其现实主义风险在加剧。要使中拉关系增强抵抗内外部风险的能力，突破瓶颈、提质升级，就必须超越利益驱动的洛克文化，构建更高文化层次的中拉命运共同体。

#### 四 未来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建构主义的视角

上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视角分析了中美拉三边关系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接下来将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主义理论分析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 （一）康德文化：中拉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构建逻辑

建构主义学者温特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文化）是国家造就的，可以通过行为体互动和社会建构进行主动选择，即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形成共有观念，再造施动者身份和利益，并在实践中促进了体系结构变化，实现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跨越。康德文化以友谊的角色结构为基础（但友谊的概念只涉及国家安全，即互不发动战争，而在其他领域朋友之间也会有冲突），友谊在时间上无限制。更适合康德文化的规范内化途径不是利己，而是合法性，即行为体发自内心地认为约束是合理的，从而心甘情愿地遵守相关规范和制度。<sup>①</sup>虽然上述理论将康德文化的友谊概念限定在集体安全领域，但其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逻辑为我们创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进路提供了启示。我们可以将未来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设定为一种康

<sup>①</sup>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72-310页。

德文化友善共同体的建构进程：在现有基础上，中拉双方通过双边、多边交流和整体合作继续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互动，在中国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拉美国家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寻求共识，形成更多的共有观念，通过现有或新的制度得到各方认同，进而建构全新的行为体身份和利益，减少利己身份的成分，建立更多的集体身份，在观念和文化上建立紧密的精神纽带和伙伴关系，形成基于友谊角色结构的友善共同体。

中拉形成这样的友善共同体已具备一定的基础。一是，中拉关系在物质层面已经打下坚实的基础。中拉经贸关系经过数十年的自发和自主发展，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已经日趋紧密。中拉货物和服务贸易额不断增加，中国已成为拉美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仅次于美国，甚至已成为一些拉美国家的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中国已与智利、秘鲁和哥斯达黎加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并正在与更多的拉美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拉美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第二大目的地，投资增量和存量不断增加，投资主体、对象和地域日益多元化。在此基础上，拉美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共建协议。此外，中国和巴西两个大国利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引领中拉合作，诸多拉美国家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加入美洲开发银行，中国建立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一系列举措都助力中拉经贸、金融合作迈上新台阶。二是，中拉在观念层面已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以来4次访问拉美，中国先后发布两份对拉政策文件，中拉先后召开两次中拉论坛部长级会议，双方在国际政治事务、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化、自由贸易、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应对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议题上有广泛共识，都认同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和全球治理制度的基本原则，在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G20）等一些国际多边舞台上广泛合作。三是，中拉已拥有一定的集体身份和共同利益。20世纪下半叶，中拉共同拥有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在国际事务中患难与共，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真诚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自身发展的权益。当前，中拉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都反对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希望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维护双方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总之，中拉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文化和价值观差异，不具备类似北大西洋国家或欧盟国家之间在文化和价值观方面所天然拥有的共有观念和集体身份，但中拉之间

有充分的政治互信，双方人民之间自古友谊深厚，基本不存在地缘政治矛盾和冲突，基本不存在任何一方因文化中心论导致的心理优越感，都认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都有着对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渴望。此外，中拉双方有加强互动、形成集体身份和集体利益的共同愿望，相向而行，基本不存在一方积极主动而另一方消极或抵制的情况，因此具备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条件。

## （二）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如何将有限的洛克文化认同发展为充分的康德文化认同，扩大集体身份范畴？温特指出，文化具有保守性质，体系结构的变化非常困难。体系中的重要行为体（一般指大国）必须改变其行为，持之以恒地开展造就朋友的“亲社会”活动，才能打破维持体系稳定的内在根源（行为体自身对安全和秩序预期的需求）和外在根源（制度对行为的奖惩），导致文化的变化和集体身份的增加。<sup>①</sup> 作为在世界上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大国，中国近年来在中拉关系中积极作为，创造性地提出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构想和方案，在双方互动中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2014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中拉应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得到拉美国家的广泛认同。中国的积极行动已为中拉构建具有康德文化特点的命运共同体开辟了道路。未来，中国要继续与拉美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加强互动。首先在物质层面通过更高层次合作化解既有矛盾，构建更稳固的利益共同体，为建构共有观念创造物质条件；其次在文化层面加强交流互鉴，构建价值共同体，从而全方位建构共有观念、集体身份和集体利益。

第一，在全球治理上加强合作。在国际风云变幻、现实主义威胁不断增加、非传统风险加剧、全球化受挫的背景下，通过真诚互动明确和加深中拉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有观念，巩固和加强双方在国际政治上既有合作伙伴的集体身份和共同利益。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贸易分工、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逐渐就自身对全球治理的责任和作用有了越来越明确的认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事件导致“全球治理失灵”、新兴经济体力量上升导致全球权力转移、西方发达国家相对衰落并出现逆全球化趋势、全球治理规则改革滞后

<sup>①</sup>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30-333页。

的情况下，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方案，号召各国妥善处理利益和观念冲突，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和世界共同利益。拉美有33个国家，在国际组织中拥有重要地位和议程设置能力，在全球治理多边场合有很高的集体谈判能力，因拥有西方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而在现有国际体系中有更多话语权，同时积极为发展中国家发声。中国应借助拉美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地位，将其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突破口，向拉美并进而向西方阐释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利用现有国际机制使中国观念、中国方案获得更多认同，争取更多共识，建构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身份。

第二，实现更高层次的经济合作。通过“一带一路”平台加强中拉产能合作，建构产业链重塑者的新集体身份，在保证共赢和双方绝对收益的前提下化解相对收益分配不均带来的矛盾，建构国际价值链上共赢的新集体利益，拿出足够的诚意来交朋友，真正做到同呼吸、共命运。在中右翼主导拉美政治生态时期，很多国家希望通过加强与美国合作融入全球价值链。而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优先”、鼓励制造业回归、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新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进行谈判等举措，使拉美国家只得对其国际合作取向做出重新调整，并将更多注意力投向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和产能合作倡议。虽然特朗普政府执政后期提出“美洲增长”倡议、拜登政府提出“重建更好世界”(B3W)倡议，但这两个倡议目前在拉美并未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明显的冲击和替代效应，大部分拉美国家对中美两国的倡议和投资均持开放态度。当前，中拉在经贸领域的冲突主要来自贸易不平衡对拉美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中国提出将本国具有竞争优势、适应东道国输入需求的产业整体输出，再发展到将企业生产价值链中各个生产环节进行全球重新布局，可以帮助东道国建立更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制造能力。当前，全球产业链结构因新冠疫情冲击而面临调整和重组的可能，这为中拉产能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中拉应利用中国在资本要素、拉美在劳动力要素上的比较优势和互补性，以中国市场、拉美本土市场、第三方市场为导向在不同行业开展产能合作，同时做好法律法规等外部机制建设，从而在实现中国产业向高端制造发展的同时促进拉美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中拉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共同跃升和共赢。<sup>①</sup>这一新集体身份和集体利益将有

<sup>①</sup> 吴白乙主编：《面向新时代的中拉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36页，第144-189页。



效减轻相对收益分配不平衡，从而减少冲突、增进友谊。

第三，实现更有效的人文交流。通过互学互鉴，减少隔阂和误解，使中拉双方超越纯粹理性主义的功利关系，在观念和文化上建立紧密的精神纽带和伙伴关系。中拉在近现代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命运，双方之间本就相互理解和同情，在主张捍卫人的尊严、追求平等和正义、主张文化多元主义和“去中心化”等方面均有共识。近年来中拉文化交流从文艺演出、展览、艺术节等传统合作领域扩展到文化产业、传媒、留学、学术交流等新型合作领域。然而据调查，拉美国家民众对中国形象持正面态度的比重虽高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但远低于非洲国家民众对华持正面态度的比重。此外，拉美国家民众对美国甚至日本的正面认知度都比对中国高。<sup>①</sup> 这既显示出西方媒体不实报道和“新殖民主义”言论给拉美人带来的对中国的疑虑和误读<sup>②</sup>，也暴露了中国对外传播策略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将对外传播机制视为一种主体对客体的“独白”过程，希望依靠单方面“运动式”外宣来改善国际形象。而建构主义则强调主体间应进行持续互动和身份互塑，形成一种共有的理解和期望、一种共享的观念和关系文化。<sup>③</sup> 国家形象不是一个客观既定的个体实物和自我设计的产物，而是一种国家身份和国家间相互认同的关系，国家形象传播要通过国际社会互动实践建构正向身份和共有观念，寻求他国对本国的正向认知和正向认同。<sup>④</sup> 可见，未来中国应潜心研究如何真正以朋友的姿态走进拉美，想其所想、以心交心，这样才能使友谊超越利益，不惧考验。

大部分拉美国家对中国在各领域发起的互动给予积极回应，因为与中国加强合作显然符合其根本利益：经济上，利用“中国机遇”融入亚太地区产业链，促进自身“再工业化”进程，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政治上，借助与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合作来强化外交多元化，增强其外交自主权，平抑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sup>⑤</sup> 当前，拉美主要国家政治格局出现“左转”态势，

<sup>①</sup> 吴白乙主编：《面向新时代的中拉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45页，第251页，第266页，第268页。

<sup>②</sup> Osvaldo Rosales V., *El Sueño Chino: Cómo se Ve China a sí misma y Cómo nos Equivocamos los Occidentales al Interpretarla*, Buenos Aires: Siglo XXI Editores Argentina, Santiago de Chile: Cepal, 2020, p. 13.

<sup>③</sup> 冯若谷：《“身份互塑”与“关系文化”——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的对外传播观》，载《现代传播》，2015年第5期，第51-54页。

<sup>④</sup> 钟新、张超：《新时代中国大国形象的四个维度与两种传播路径——基于习近平相关论述的分析》，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第40页。

<sup>⑤</sup> 吴白乙主编：《面向新时代的中拉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32页。

我们应利用这一机遇，在巩固中拉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加快构建价值共同体，将中拉合作推向新的高度。

### （三）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在政治上面临来自美国的挑战。拉美和美国同属西方文化，有着相似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自19世纪以来，美洲国家就内在凝聚在“西半球理念”周围，包括不干涉原则和代表性政府（人权）原则。<sup>①</sup>从“门罗宣言”到“争取进步联盟”再到北美自由贸易区，虽经历曲折和反复，但美国对拉美的政治经济控制从未放松。<sup>②</sup>相比之下，中国与拉美距离遥远、文化迥异，政治经济关系还有待发展。因此在对拉关系上，中美不具对等性。近年来美国鹰派认为中国积极同拉美发展政治经济关系是在挑战美国霸权，是在寻求对美国对华遏制政策和“重返亚太”战略进行对冲和反制，并利用中拉经济关系的“杠杆效应”迫使美国在亚洲事务上做出让步。<sup>③</sup>鉴于此，美国对中国在拉美的存在进一步警惕。近期，随着中美技术竞争加剧，美国向巴西等国施压，促其放弃与中国华为公司在5G技术上的合作。另外，在新冠疫情暴露全球供应链脆弱性后，美国意图将其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向西半球收缩，这不但会促使墨西哥在现有基础上加强与美国的紧密经济合作，也为南美洲国家参与美国全球供应链提供了机会。美国或许会通过这些手段强迫拉美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而中国要想经受住这一考验，在美国“后院”交朋友，首先还是要通过现有机制加强中拉整体合作，巩固共有观念；其次要灵活处理与不同拉美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尽可能克服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分歧造成的障碍，利用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建构集体身份和集体利益，拉近心理距离。应当看到，大部分拉美国家自21世纪以来在国际关系和对外经贸关系上秉持务实态度，逐渐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在中国、美国、欧盟等各方之间寻求平衡，虽然在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摆脱美国的影响，但在处理中美拉三边关系上会做出理性选择。

中拉文化差异造成双方不同程度的群体认同。中国文化强调集体利益和

<sup>①</sup> Peter J.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26.

<sup>②</sup> José León-Manríquez and Luis F. Alvarez, “Mao’s Steps in Monroe’s Backyard: Towards a United States-China Hegemonic Struggle in Latin America?”, in *Revista Brasileira de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No. 57 (spe.), 2014, p. 10.

<sup>③</sup> Daniel Morgan, “Expanding the Rebalance: Confronting China in Latin America”, in *Parameters*, Vol. 45, No. 3, 2015, pp. 103 - 104.

大局观念，而拉美所继承的西方文化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体权利。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暴发，中国从大局出发，用强有力手段控制住疫情，并号召世界各国加强合作，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而许多拉美国家对疫情并不十分重视，不愿牺牲个人自由来换取群体利益。例如巴西总统博索纳罗消极对待疫情防控措施，质疑口罩的防病毒传播作用，公开表示自己不会接种疫苗，也不建议国民接种疫苗。<sup>①</sup>温特指出，人们往往因害怕“非个体化”使自己被群体需要淹没而抵制文化的内化，而利己主义对国家的吸引力更大。因此，集体身份是分层次的，相较于共同安全，国家对责任分担、经济发展、文化独立表现出更小的群体认同张力。<sup>②</sup>这种个体主义和自我保护意识还表现在中拉经济合作过程中拉美当地人充分强调其文化习俗和劳动法规，表现出强烈的权利意识和环保诉求。面对文化差异，中国应秉承求同存异的原则，努力挖掘双方文化中的一致性和共有理念来创造更多群体认同。我们一方面应向拉美阐释中国“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的义利观和“以世界责任为己任”的天下观；另一方面也应阐释中华文化中自助与助人之间的“非零和”理念，即集体利益的实现并不必然以牺牲个体利益为代价，而是要在实现个体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与集体利益共赢，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推己及人”“美美与共”。

## 五 结论

当前，美国各界在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这一问题上已形成共识，未来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必将受到来自美国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为了给自身发展创造稳定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必须广交朋友，扩大伙伴关系网络，而拉美对于中国创建新型国际关系有其独特的重要意义。

中拉同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发展程度相似，经贸合作突飞猛进，有很好的合作基础，同时拉美的初级产品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有重要意义。然而，现阶段中拉关系仍处于理性主义、利益驱动的洛克文化之中，其复合相互依存关系给双方带来的绝对收益并不能掩盖相对收益分配的不平衡。中拉

<sup>①</sup> 参见《质疑口罩又不愿打疫苗？巴西总统放话：我不接种，巴西人也不需要》，腾讯网，2020年11月27日。<https://new.qq.com/omn/20201127/20201127A0EFQF00.html>。[2022-03-23]

<sup>②</sup>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96页。

贸易虽然互补性强，但贸易结构和合作模式中的不合理因素在客观上不利于拉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而引发拉美国家对中拉合作的消极情绪。此外，美国历来视拉美为其“后院”，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更是对中国在拉美的一举一动十分敏感。因此，中拉关系的内在矛盾和外在不利条件使中拉命运共同体构建面临巨大挑战。如果中拉一方面能够超越纯粹理性主义的功利关系，实现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跨越，另一方面能够在美国霸权因素存在的条件下，使中拉关系提质升级，那么其将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典范，必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重要贡献。

康德文化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是行为体互动和社会建构的结果。中国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必须积极作为，利用国际多边机制和中拉双边及整体合作平台与拉美国家开展更广泛、更深层次的互动，在现有政治共识的基础上形成更多共有观念和群体认同，通过全球治理合作、产能合作和人文交流，互塑新的集体身份，建构新的集体利益。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可以借鉴建构主义理论的逻辑，但同时我们应明确，建构主义属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温特提出的康德文化友善共同体是以西方为中心向东方扩展，并且将友谊的概念限定在集体安全领域。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体现中国智慧的理念，直接以天下为分析单位，更具包容性，而且将集体利益的概念扩展到安全、政治、经济、可持续发展、文化等各个领域，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当前，我们正从相互依存的世界体系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国家间利益基本和谐、世界持久和平的全球共生体系发展<sup>①</sup>，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美国因素和中拉文化间的差异是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挑战，而因疫情加剧的全球经济不景气也可能使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暂时超越群体利益。因此，中拉关系将在理性主义的现实考量和建构主义的理想期望之间曲折发展。

(责任编辑 王 帅)

<sup>①</sup> 夏立平：《全球共生系统理论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载《美国研究》，2017年第1期，第28页。